「人爲」災禍

春璇

英國科學家牛頓曾遇到一件欲哭無淚的事，那是一六九二年某夜，科學家的愛犬將主人外出沒有熄滅的蠟燭碰翻，把牛頓二十多年的光學研究手稿及其他資料燒成灰燼。科學家回到家對愛犬說：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惡作劇有多可惡！」

可以想見，要是牛頓的手稿當時被蛀蟲吞噬，或經洪水浸泡化爲紙漿，或遭雷電引發的火災焚毀，他絕不會如此痛徹心脾！愛犬與別的無甚靈性的寵物不同，主人外出時，牠是負有守望家園責任的。但同時，牛頓也深知愛犬即使再有靈性、再通人性，牠終究是動物，而不是人。所以，牛頓的沮喪仍然「有限」。是啊，各種各樣的無情災禍只要與「人爲」無涉，從理性角度看，人們仍能接受。否則，痛苦就是永遠填不平的無底洞了。

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六日，北京「藍極速」網吧的發生火災，二十四人葬身火海，其後又有一名傷者不治。這是一場縱火案，作案者是一群十四至十七歲不等的青少年，所以無一人判處死刑。法官要求少年犯當庭向心已碎盡的受害家屬說一聲「對不起」，但他們仍橫眉豎眼、梗着頸脖，表示拒絕。從某種意義說，孩子們雖已站在被告席內，但身心並未從犯罪現場離去，拒絕道歉就是縱火心態的延續。這可是最令人寒心的童心的冥頑。

至於他們的縱火動機，說來簡單之極，因爲新開張的「藍極速」網吧不肯除賬，將他們拒之門外。他們羨慕享受新設備的顧客，記恨「小器」的老闆。於是，他們用可樂瓶盛着從加油站買來的汽油，潑向網吧的木製樓梯，並劃了一根火柴。在點燃烈焰的一刻，他們耿耿於懷的怨恨仍屬童年的稚氣。這就是法庭「輕判」他們的理由。然而，這卻是眞正的「人爲」災難，二十四個人被大火燒成焦炭，以呼喊求救的姿態「定格」於現場。說眞的，牛頓家當年火場的損失，不抵「藍極速」網吧的萬分之一！

《燕語》呢喃的力匡

許定銘

力匡（一九二七至一九九一）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影響力很大的詩人。他是廣東人，原名鄭健柏，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。一九五〇年到香港，在各大報刊上發表新詩，深受年輕人歡迎，文藝青年爭相倣傚，形成風氣，甚至有人稱那年代的詩歌爲「力匡體」。力匡除了寫作，還當過《人人文學》和《海瀾》的編輯，大力扶植新人，對香港文壇貢獻甚力。

力匡的第一本詩集是《燕語》（香港人人出版社，一九五二），屬《人人文叢》之二，之一是黃思騁的小說《當春天再來的時候》。《燕語》是三十六開本，四十六首新詩分爲《燕語》、《和平》和《幸福》三輯。研究者張詠梅在《北窗下呢喃的燕語》（香港自印本，一九九七）中，總結力匡早期的詩時，說他的「詩風溫婉純淨，主題明朗，絕不晦澀」。還說他的詩作雖不算上乘，但在香港新詩史上，應佔有一席位置。

力匡一九五八年移居新加坡當教師、圖書館主任，直到退休、終老；但他念念不忘香港，一九八〇年代還有新作及回憶文章寄回本港發表。他在香港出版的詩集還有《高原的牧鈴》（香港高原出版社，一九五五）。除新詩外，力匡還用筆名百木寫小說，出過《良夜》、《諸神的復活》和《聖城》；文集《北窗集》、《阿弘的童年》、《談詩創作》等書。

《大公報》首創「文藝獎金」

陸茂清

本報文藝獎金揭曉
本報二十五周年紀念徵文獎金一千元，茲由文藝獎金委員會審查委員楊今甫、朱佩弦、朱孟實、葉聖陶、巴金、靳以、李健吾、林徽因、凌叔華、沈從文諸先生投票推薦作家，其得全體委員過半數推薦之當選人及其作品披露如次：
曹禺（戲劇《日出》）
蘆焚（小說《谷》）
何其芳（散文《畫夢錄》）
除專函通知當選之三先生外，敬希讀者諸君注意。

《大公報》創刊於一九〇二年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資金不繼與戰亂停刊。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，吳鼎昌、胡政之、張季鸞合組的「新記公司」接辦《大公報》，進入了該報歷史上的「輝煌時期」。一九三六年四月，《大公報》創辦上海版，津滬版同時發行，當年的發行量就突破了十萬份，成爲全國新聞界的翹楚。

重新開張十周年之際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，《大公報》頭版頭條刊登「報社特啓」，宣布舉辦「文藝獎金」。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首創，堪稱一鳴驚人。

文藝獎的具體操辦者，是現代著名作家，記者、時任《大公報》文藝編輯的蕭乾，此君一九二九年就讀於燕京大學新聞系，畢業後進入《大公報》任《文藝》副刊的編輯。

七月的一天，總經理胡政之約見蕭乾，說是想搞一次全國性徵文作爲紀念，蕭乾即表贊同。

胡政之徵詢如何搞法，蕭乾建議：若是廣泛徵文，來稿必多，層層篩選面廣量大，評委又多有本職，恐是忙不過來。不如參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普立茲獎金，從已出版並有初步評價的作品中評選，設爲「大公報文藝獎金」。胡經理聽了頗以爲然，委託蕭乾擬定辦法、開列評委名單，並全過程具體操辦。

蕭乾欣然應承，他也因此贏得了「中國文學獎的發起人和最早的實踐者」的美譽。

九月二日，《本報復刊十周年紀念舉辦科學及文藝獎金啓事》刊出，內中關於「文藝獎金」的旨要如下：

本年九月一日，適為復刊滿十周年之期，茲為紀念起見，特舉辦文藝獎學金，定名為「大公報文藝獎金」。

以一千元充文藝獎金。每年得獎人數，以一人至三人為限，即自本學年開始至學年終了為一年，每年評選一次，定期三年，如有變更，至期滿另行通告。

聘定楊今甫、朱佩弦、朱孟實、葉聖陶、巴金、靳以、李健吾、林徽因、凌叔華、沈從文諸先生，擔任文藝獎金審查委員。

不日，蕭乾與評委們擬定了「文藝獎金」的詳細辦法，登報公布。

蕭乾開始了「文藝獎金」的操辦，因是前所未有的創舉，所以是格外的認眞又努力，忙了個不亦樂乎。時評委們分散在天津、上海、武漢各處，條件的限制，難以集中開會商討，好在他們都是與《大公報》「文藝」副刊關係密切的著名作家，就由蕭乾以信函形式溝通協調，諸如組稿、評判、意見的通達與歸納。經無數的書信往來，漸漸歸於基本統一，至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，《本報文藝獎金揭曉》在《大公報》上公布：本報二十五年度文藝獎金一千元，茲由文藝獎金委員會審查委員楊今甫、朱佩弦、朱孟實、葉聖陶、巴金、靳以、李健吾、林徽因、凌叔華、沈從文諸先生投票推薦作家，其得全體委員過半數推薦之當選人及其作品披露如次：

曹禺（戲劇《日出》）

蘆焚（小說《谷》）

何其芳（散文《畫夢錄》）

除專函通知當選之三先生外，敬希讀者諸君注意。

據蕭乾的回憶，評委們的共識，各種文藝體裁之間本無高低之分，所以並未搞第一獎第二獎，一千元由三位平分。

評委還對獲獎作品的三個作者作了客觀公正的評價：

《日出》的作者曹禺：他由我們這腐爛的社會層裡雕塑出那麼些有血有肉的人物，貶責繼之以撫愛，直像我們這個時代突然來了一位攝魂者。在題材的選擇、劇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運用上，都顯示着他浩大的氣魄。這一切都因為他是一位自覺的藝術者，不尚熱鬧，卻精於調遣，能透視舞台的效果。《谷》的作者蘆焚：他和農村有着深厚的關係，用那管糅合了纖細與簡約的筆，生動地描出這時代的種種騷動。他的題材大都鮮明親切，不發凡俗，的確創造了不少眞摯確切的人型。

《畫夢錄》的作者何其芳：在過去，混雜於幽默小品中間，散文一向給我們的印象多是順手拈來的即景文章而已，在市場上雖曾走過紅運，在文學部門中卻常為人輕視。《畫夢錄》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製作，有它超逸深淵的情趣。作者生長在四川，讀過他的《還鄉雜記》當能知道不少他的幼年生活，更眞切的說明是他那篇自述《論夢中的道路》。

同日的《大公報》，還配發了題爲《本報文藝獎金發表》的社評，社評表達了「本報同人深謝諸委員專家之同情盡力，俾本報得到介紹上列三君文藝作品之光榮」後，向社會與讀者「貢獻同人感想」：「文學之偉大力量，戊戌政變、辛亥革命，其原動力即文學，當年之文壇前輩，於異族專制之陰霾酣夢中，奮其如椽之筆，以喚醒民族……迨入民國，中國文壇則又展開新頁，呈現異彩，代表此階段之趨勢者，即五四運動，提倡白話詩文，期文學之民族化，此為近二十年來新文藝發達之始……」

社評在列舉了「最近數年之中國文藝界似反不如十數年前之生氣蓬勃」，出於強烈的責任感而「致其希望之詞」：——希望社會各方面注意及尊重文學，應多設各種獎金，共同扶掖中國文運之進步。

——希望政府於各庚款項下，劃出巨額基金，以為獎勵文藝之用，同時希望保障文藝界最大限度之自由，並為之謀各種之便利。

——希望全國新興作家，決心完成近代文壇前輩未完成之事業，把握現階段救亡衛國之急需，共以義俠之精神，悲憫之態度，以進民德，以浚民智，以泯社會之不平，以除風俗之病態。文學家應勇敢的保持其合法著作自由，對一切問題為公誠的批判指導，勿頹唐，勿苦悶，以喚起不文不字之人……

《大公報》一九三六年舉辦的「文藝獎金」，乃名副其實「中國現代報刊史上開創性的大手筆」，其創設，成爲後來林林總總延續至今的文學獎、文藝獎的肇始。

大師遠逝，誰來接班？

陳魯民

近日，隨着季羨林、任繼愈兩位文化大師駕鶴西去，一個愈發突出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：大師遠逝，誰來塡補大師留下的空缺？

時代需要大師，文化呼喚大師。文化大師有什麼標準？即以剛去世的兩位大師爲例，大師是一言九鼎的學術權威，大師是學富五車的學界泰斗，大師是著作等身的文化巨擘，大師是一呼百應的領軍人物，具備這幾條標準，方可戴上文化大師的桂冠。倘若按圖索驥，我們現在還有這樣的大師嗎，即便有，恐怕也少如鳳毛麟角，而且還可能是頗有爭議、並非大家一致公認的。

沒有文化大師，評選幾個不就行了？就像如今每年都在頻繁地評選各種各樣的榮譽頭銜那樣。可文化大師畢竟不是像超女那樣票選出來的，多花錢拉票就能弄個大師幹幹。文化大師雖然不是完人，但起碼有兩條要站得住腳，一方面在學術上要有獨特建樹，自成體系，影響巨大，這可不是東拼西湊、漿糊加剪刀所能奏效的，也不是到處掛名當主編所能立得住的；另一方面，在道德上要高風亮節，光明磊落，沒有操守上的明顯瑕疵，具有強大的人格魅力。

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。想當年，章太炎、王國維、陳寅恪、魯迅等被公認爲文化大師時，也不過才四五十歲年紀，可今日，放眼望去，這個歲數的學人似乎還在尋尋覓覓，沒有一個大師浮出水面，居然還得靠那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先生在高舉帥旗，勉爲其難。這似乎說明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規律在我們這一代文化人身上有些「失靈」了，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趨勢也有點難以爲繼了，捫心自問，我們應該愧對這樣一個應該出大師也可以出大師的年代。

季羨林老在談到自己的成功經驗時說：一個人要有所成就，一要靠才能，二要靠勤奮，三要靠機遇。這實際上是在告訴我們，一個成功者必須要這樣努力才能心想事成，一個文化大師也必須這樣打造才能立足於世。平心而論，我們現在有才能的人很多，絲毫不比季羨林、任繼愈們遜色，機遇也只會比他們多而不會少，所差的主要是堅韌持久的勤奮精神，不願花大量時間在學術研究上，總想找終南捷徑，不肯下大功夫去積累攻關，老是幻想天上掉餡餅，所以，他們不僅成就功業難望大師之項背，學術造詣也遠不及前輩大師。

文化需要巨人，學術需要大師。眼下，一個個大師遠逝留下的眞空，使我們愈發感到他們的重要，也愈發希望新一代大師能盡快接班上任。因而，那些希望自己成爲大師的、被人看好有大師潛質的文化精英們，請再加把油，更勤奮，更刻苦，前進的速度再快一些。時不我待，我們望大師已如久旱而望甘霖，有些望眼欲穿了。

大師遠逝，誰來接班？

享受巴塞羅那的美

高迪設計，至今仍未完成的神聖家族大教堂 羅克攝

馮羽

巴塞羅那的美不是用來觀賞，而是用來享受的。這個城市每個角落都散發着節日般的閒散和享受氣氛。每天下午兩點到五點大小商店都關門，大家都有吃飯午休的奇怪現象。當你漫步到海邊，到處都是躺着曬太陽的人群，旅遊高峰時節滿眼都是熱辣的吊帶美女，海灘上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。

站在巴塞羅那的任何一個地方，高高抬起頭，就能看到裹着腳手架的神聖家族大教堂，那是不一樣的尖頂，不一樣的雕塑，不一樣的教堂。教堂始建於十四、十五世紀，在一八八四年由建築師高迪設計修建，這是他設計生涯晚期的作品，具有十九世紀的新哥特風格，但至今還未完工，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至今還在興建中的天主教大教堂。它巍峨壯觀的形態更是使它成爲巴塞羅那的標誌性建築。完美主義的高迪給人們留下了一件沒有完成卻又十分完美的作品。天才是無法模倣的，於是作爲高迪的遺作，大教堂永遠留着腳手架。這是一個城市向大師的致敬，也是一個城市浪漫到極致的表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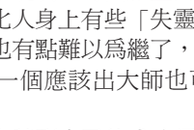
巴塞羅那是個需要用心慢慢品味的城市，這裡的文化、藝術都濃重的浸透着城市的每一個角落，倘徉在小巷子會被突然出現的畢加索博物館，各種精緻的藝術品小店，比德國時髦幾千倍的服裝舖和玻璃坊所驚訝，繼而被迷惑。一個在巴塞羅那生活了十幾年的藝術家說：「如果你想在巴塞羅那做出一番成就，必須得有強大的意志力，因爲只要你願意，每個晚上都有聚會等着你，甚至好幾個聚會。」可能眞是這樣吧，據說法西斯統治時期，在巴塞羅那每個人仍然有好幾個情人，在這裡你可以放縱自己的感官，盡情享受生活中的每一種樂趣。

到了周末，走在蘭布拉大街，對於行人來說絕對是個享受。這裡成了花的海洋，芬芳四溢。路邊有拉琴賣藝的。爲人畫素描的，身塗油彩做活雕像的，還有擺地攤賣各式民間古董的，整條大街充滿了明快的生活樂趣。穿着隨意，不拘小節的巴塞羅那人就在這樣的街道上悠閑遊蕩，看看活人雕塑，看看賣花姑娘。夜間十點鐘的巴塞羅那，路上熱鬧依舊，路邊的酒吧咖啡館必定爆滿，巴塞羅那人愛喝酒，周末常常三五知己相約，不醉不歸。這份生活的閑適只怕神仙也要羨慕。

如果能在蘭布拉大街看上一場出色的弗拉明戈舞，那此行才算得上完美。弗拉明戈舞，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說，充滿強烈的戲劇性和色彩對比。弗拉明戈不僅是歌、舞和音樂的三合一藝術，同時也代表着一種慷慨、狂熱、豪放和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。看着那紅色的裙擺翻滾着，激烈的節奏和那悠揚的身姿，實在太享受了，當孤獨女人舞起來的時候，表情依然是冷漠甚至痛苦，而肢體動作充滿了熱情。一個小時的演出，無論是單舞，群舞，不得不讓人心潮澎湃，這難道不是一幅幅最性感的畫面。

一座神奇的教堂和一條美麗的街道，蘊涵了這個城市的精髓。有着「浪漫的藝術天堂」美譽的巴塞羅那，既有西班牙熱情親切的民族特性，又與法國的浪漫情調融合在一起，成爲追求浪漫與浪跡天涯的人們的首選，品着西班牙紅酒，看着那紅色舞裙擺動翻滾，實在是一種頂級享受。

說「海東」



馬斗全

天津市、遼寧省、山東省均有多家文化單位或商貿公司以「海東」爲名，黑龍江省也有《海東詩壇》報等，大概皆因其地在海邊或距海不遠的緣故吧。江蘇、浙江、福建等省也有不少以「海東」爲名的公司或廠家。當然，上海的「海東」就更多了，除公司、廠家外，還有「海東公寓」、「海東社區」等。這使人想起閻肅作詞、毛阿敏演唱的謳歌上海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的《東方明珠》，其中有句重複多遍的歌詞爲「幾多心血注海東」。歌詞中的「海東」，即指上海。

如果不是其他具體原因，而眞是因爲東臨大海，便以「海東」指上海、天津、遼寧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等地，那就全錯了。

海東，古來指日出之處，指海的東邊，如杜甫詩句「驅石何時到海東」與郝經詩句「不逐秦鞭到海東」，即指秦始皇欲過海觀日出之處，典出《齊地記》。

杜甫又有詩句「紅見海東雲」，指海東面的雲。以至清代，王沂暄詩有「海日曈曈出海東」句。因日本和朝鮮在海的東面，所以又以「海東」指日本和朝鮮，如王維《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》：「積水不可極，安知滄海東。」李白《高句麗》：「翩翩舞廣袖，似鳥海東來。」近世則多指日本，詩句如黃遵憲「蓮峰湧出海東濤」、陳寅恪「波濤重泛海東船」、羅元貞「遊學當年滯海東」，梁啓超有「學風沾被全國以及海東」語而從不把海西面岸上的地方稱爲「海東」。海西面岸上之地，應稱「海西」，古之海西縣、海西郡，均在今江蘇省。上海等地在大海的西邊，怎能稱「海東」？「心血注海東」，字面意思爲心血傾注於海之東，容易使人想到日本。

中國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之際，此歌曾在電視中多次播映，難免給人以滑稽之感。

好習慣擊敗壞習慣

林鳴

除了法紀嚴明，人人自律也非常重要。一個人的自覺反省，比一百個監督員都管用。衆所周知，養成一個好習慣，可以受用終身；而養成壞習慣，關鍵時刻會讓你吃盡苦頭。從道德範疇講，假如人人都有好習慣，並將它們集聚起來，就能產生巨大的力量，並收穫一個美好的結果。著名心理學家威廉·詹姆士說：「播下一個行動，收穫一種習慣；播下一種習慣，收穫一種性格；播下一種性格，收穫一種命運。」的確，許多好習慣開始會讓人感到拘束和不自在，久而久之，你就會爲自己擁有這份美德而驕傲。正所謂觀念變，行動就變；行動變，習慣就變；習慣變，性格就變；性格變，命運就變；命運變，人的一生就改變。

既然培養好習慣猶如植樹，那麼就該爲它培土澆灌。也就是說，對好習慣要勤勉勵，多嘉獎。我說的可不是一般意義的口頭表揚，而是給予實實在在的獎勵——包括物質的。聽說有個城市的政府在幾個街區舉行評比，許諾哪個街區地面的痰迹少，就優先爲其改善環境。其中一個街區的居民特別努力，把吐痰、丟垃圾的毛病消滅近無，結果政府眞的給他們蓋了小花園。

儘管好習慣能在短期內擊敗壞習慣，若想徹底改變局面，需要耐心和時間，別指望一仗取得完勝。還有，要及時爲百姓找到替代品和提供方便，比方爲消費者提供環保塑料袋，以及吐痰者使用的紙巾和垃圾箱等等。如能實現「讓養成壞習慣的人羞愧，讓擁有好習慣的人自豪」的目標，人們的生存環境無疑將變得更加宜人。

前年到高原小城玉樹，我發現了一個「奇跡」——這裡風景如畫，玉樹臨風，卻很難看到塑料袋。上街買點水果，攤主客客氣氣地說：不好意思，沒有塑料袋噢。我們只好手捧着西瓜、兜裡揣着西紅柿返回賓館。路遇當地居民，許多人都手舉着剛買的商品，樣子挺吃力的，臉上沒有抱怨的神情。

黔東南凱里，是座有名的「斑馬城」。小城擁有一道獨特的街頭景觀——全城居民都走「斑馬線」。之前，朋友好心提醒，在凱里市過馬路要「小心」。慚愧的是在北京住久了，我已養成隨便穿越馬路的散慢習慣，想打哪兒過就在哪兒過，這在凱里是要受罰的。我注意到，執勤交警雖然很少，但過往行人都很自覺，連外地遊客、提籃挑擔的少數民族也都規規矩矩地走「斑馬線」。偶爾瞧見一兩位亂走者，周圍人就用瞧怪物的眼神瞧着他們。

和一線城市相比，這兩座小城市算是「小拇指」。沒想到，人家「拇指」一點，卻做成一項了不起的「工程」。要知道，像亂穿馬路、濫用塑料袋等陋習，在經濟和文明高度發達的大城市都屬難以解決的「壞習慣」，那麼凱里和玉樹是怎麼讓「好習慣」打敗「壞習慣」的？答案非常簡單：「嚴刑峻法」。有例可證——北京等城市開展的「禁塑」戰役，目前只能說是打贏了一半——超市、商場做得還算滿意，可農貿市場免費塑料袋死灰復燃。遭遇同樣尷尬的還有「餐館禁煙令」，大多數餐館已經向就餐煙民妥協，默認了他們噴雲吐霧。這不僅說明壞習慣的力量和慣性，更說明法律法規的軟弱和缺乏後勁。民不畏法，法奈之何？一位來自大城市的遊客曾說，亂穿馬路，在我們那兒敢，在凱里就不敢。爲什麼？因爲百姓畏法，而不畏說教。玉樹居民之所以遠離塑料袋，也在於當地政府嚴厲舉措貫徹得力。再說，三江源是中華民族的「水塔」，弄髒它就是千古罪人。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，誰敢？